

第六輯

文心雕龍學刊



文 心 雕 龙 学 刊

第 六 辑

《文心雕龙》学会编

齐 鲁 书 社

鲁新登字07号

文心雕龙学刊

第 六 辑

《文心雕龙》学会编

*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35印张 299千字

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

ISBN 7—5333—0229—X

I·94 定价：6.40元

目 录

关于《文心雕龙》弘扬人文精神的思考…………… 吴调公 (1)

踏勘《文心》体系形成的轨迹

——从它的篇次结构谈开去…………… 石家宜 (17)

略论《文心》的常变观…………… 祖保泉 (43)

刘勰文论中的“中道”观…………… 徐季子 (60)

刘勰为意境论的出现所作的理论准备…………… 阮国华 (69)

刘勰论诗歌的结构特征与美感特征…………… 王景祺 (108)

“文之枢纽”的创作主体论

——有关《征圣》的思考…………… 涂光社 (124)

论《文心雕龙》“文之枢纽”前三篇的理论结构…………… 冯春田 (142)

刘勰文体论识微…………… 罗宗强 (165)

“论文叙笔”初探…………… 戚良德 (185)

《文心雕龙·神思篇》“神用象通”说探析…………… 孙耀煌 (206)

风骨考论…………… 牟世金 (216)

《文心雕龙》的八体与六势辨异…………… 剑 亭 (256)

试论文气和刘勰的文气说…………… 郭晋稀 (266)

释作家之气…………… 寇效信 (281)

从《知音篇》看刘勰文学观念的发展…………… 刘 淦 (302)

《文心雕龙札记》论《原道》与《风骨》

（附：关于黄侃文论思想研究的若干问题）…… 曾晓明（317）

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

——刘勰论南朝宋齐文学…… 穆克宏（342）

《文心雕龙》新探三题…… 古建军（359）

《文心雕龙》成书年代新考…… 周绍恒（370）

刘勰生平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读牟世金《刘勰年谱汇考》…… 良 德（383）

新的探索 新的成果

——读《文心雕龙美学》…… 于维璋（395）

《文心雕龙》研究的新收获

——评李庆甲《文心识隅录》…… 汪涌豪（403）

探幽索隐 嘉惠学林

——读王运熙《文心雕龙探索》…… 邓韶玉（412）

《雕龙后集》序 ……（台湾）王更生（425）

关于《文心雕龙》弘扬人文 精神的思考

吴调公

一、为弘扬“人文”而殚精竭虑 的探索精神

按照我的肤浅的认识，研究《文心雕龙》大约有这么几种途径：有的是从这部著作的作者下手，研究其世界观和成书的年代，旁及本书的写作动机以至当时的时代背景等等；有的是从《文心》的思想内容下手，以探求全书的思想纲领、整体结构以及全书或其重点篇章所承传的思想渊源以及所受的在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玄学思潮等等；有的则从《文心》的艺术观点或审美意识下手，掘发其艺术辩证法、风格论、神思论、修辞手法、音韵声律以至鉴赏论等等。

毫无疑问，这些取径不同的研究都是有助于“龙学”的昌明的。不过，我最近在翻阅《文心》这书的一头一尾即《原道》、《序志》而尤其是后一篇时，我不禁萌发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奇想：是不是可以对这部伟大的古典文论著作中最最有创造力的阐述部分，透视其蕴藏在独到分析的背后的心理成分呢？是不是可以在立足于文论方位的同时，也可以适当联系与文论息息相通的，即他对人文传统的尊敬、神往和为之而努力张扬的感情呢？近几年来，有一些同志，先后提出了《文心》

是谈文章学以至文化学的观点。在这一方面，我认为还不宜急于给它定性。但不妨这样说，尽管《文心》是一部伟大的古典文学理论批评著作，但作者是以朴素认识把他的分析、推理放在文化学大背景之前进行论述的。由于历史局限，他混淆了“文章”与“文学”这两个领域。但也可以说，由于人文教化的特殊需要，他确乎也需要“文学”之外的“文章”。他既肯定“情貌无遗”、“以少总多”的文学作品，也需要一切符合和张扬“自然之道”的人文，因为不如此，就没有社会文明，就不可能“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原道》）。

特别是读了《序志》篇，透过作者所勾画的宇宙中万事万物的繁赜看来，他所关注和探求的何止是文学现象，或者仅仅限于解决某几个具体的创作、批评问题呢？他名为说明自己著书的用心，但其实质却处处表示他对扩而大之的“人文”的看法，旨在强调、发扬人类的性灵，显示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应有其宏伟的目标——“树德建言”。他是这样激情地说的：

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夫有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其超出万物，亦已灵矣。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

这里所说的“制作”，我认为决不是意味着文章写作，而更可以说包括渊源远古的精神文明的创造，特别是以书面为载体的文献资料的制作，如远古文字胚胎的八卦、神话，传说的河图、洛书，作为“人文之源”的人类祖先的社会意识的表象及其物化形式，传播渠道与媒介等等。这些都远远不是“文章”，更不是“文学”所能包含的，而刘勰决心要为之寻根索源的这些“制作”，既是鼓舞人们探求的“文心”，也可以说

是作为万物之灵，显然有别于人本主义的“人性”。虽说刘勰所处的时代与社会，不同于西方人文主义，然而从人性观来看，二者是有沟通之处的。刘勰强调人“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这和莎士比亚通过哈姆雷特之口而说出来的“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作品！……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哈姆雷特》第二幕第二场），几乎如出一辙。

因此，我认为研究《文心雕龙》，主要固然是用理性分析去探究它的思想体系、艺术主张以及作者生平，但对刘勰这种虔诚之心及其所沉吟的悠久文化传统的宏伟深沉境界，也决不可忽视。在理清他推理的同时，还得揣摩一下意象。这意象的确以饱和着情感和“不得已也”的决心而存在，似乎到今天还使人们听到他生命脉搏的跳动。

在《序志》中，他的决意张扬人文的一段动情的自白，说明他写作《文心》的动机，也说明“自然之道”的发挥。极而言之，就是人类文明的创造。在《原道》中，他把“自然之道”归结为人类文明的源头，并将那些根据“自然之道”来创造人类文明的先进者归结为“圣哲”的光辉传统。当然，这两个判断也就必然引导出这样的结论：人类文明的核心元素是“文心”。换言之，“文心”是规范文明思维结构的动力，是文明的深层次表征，是尊“圣人”为人文传统而决心为之发扬光大的心理状态。当然，也可以说这是一种自然法则的外化，化而为文章，为文学，为作家的主体意识和艺术构思。

这里表现了人文意识的双重组合：从《原道》篇里所举的河图、洛书、唐虞、夏后，商周，孔子，一代有一代之人文，这属于群体意识；而另一方面，从《序志》篇所描述的作者的梦想以至极意发扬传统的“文心”，却又属于这位绍圣者的个

体意识。他为梦见圣人“怡然而喜”，对那些背离理想人文规范、“讹滥愈甚”的文章深表不满，因而也就愈加感到有继承“茫茫往代”传统的必要。怎样才可以培养“文心”从而弘扬“自然”的法则呢？他提出了“凭性”的主张。他要从性灵出发去“逐物”，由此而把握事物的真相。这“性”，既是文章作者的个人之性，也是随自然之道派生而来的群体意识的萌生，特别是能够“鉴周日月，妙机极神”（《征圣》），深入到自然万物奥区中进行考察、为社会认知的“圣人”意识与行为方式。前者是指虽然同属以自然为根源的文心，但由于作者的“才性异趋”、“情性所铄”之不同，因而各人的才气不同，风格不同，这就是刘勰着重提出“体性”问题的苦心孤诣。我认为，“体性”固然意味着文章和文学的风格，但归根到底，其实也就是作为刘勰理想的人文精神或具有规范性的群体意识在特定作者心灵以至笔下的各有特性的状态和标志。后者表述人文意识的群体形态，有不同的“时序”特色，特别是圣哲的规范性，从而强调人文发扬离不开教化。

为了探求“天下之动”，为了符合自然法则而教化生民，为了发扬人们的道德文章的光辉而使之传诸后世。刘勰毕生所孜孜探求的何止是文学、文章规律？诚然，他对文学、文章深感兴趣，特别是有其深刻意义，然而推原其本意，也还是为了弘扬人文事业。在他看来，人文的弘扬，离不开文章，而文章又不离开文采。“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文采》）他探求文章和文学的规律，广泛地触及了文体、创作、批评、鉴赏等一系列问题，的确很有点象一部系统性的古典文学理论著作，但实际却从首至尾地闪烁着人文精神的光芒。全书首尾，畅论“人文”、“文心”以至自己的论“文”之

“心”。具体地说，论文体之首，于《明诗》篇中则发挥“民生而志”，于《乐府》篇中则指出歌谣产生于乡里，恰与民风巷议有关。论创作首先强调“神思”的妙用。“神思”不仅意味着一般构思，而更为突出作者主体意识的能动力量，也正是黄侃深辟的解说，所谓“以心观物”（《文心雕龙札记·神思》）。人性的发挥，归根到底是人文的张扬。论批评鉴赏，于《知音》篇中则提出最高要求，“覩文辄见其心”。应该说，这不仅仅是意味着要领会作品的“文情”，而与作者共鸣，还包括着要能以卓识远见洞达作者的“文心”，辨明其能否符合自然之道。

刘勰就是这样怀着满腔的虔诚，充溢着探究天人关系的毅力和情趣，抖擞起焕发人文精神的。通过民族思想体系的机制，他折衷传统思潮以熔铸民族文化诸因素；通过对作为儒家传统的理性主义承传，在承认“言志”原则的前提下，汲取建安以来的风格特色，极力倡导缘情。

二、“折衷”传统思潮以熔成 民族文化的凝聚力

“人文”是一个历史概念，随着不同的时代和社会而有其特定内涵，既有其传统的因袭，又有其传统的更新。刘勰所倾心倡导和大力发扬的人文，从传统说，首先是秉承孔子渊源的有益教化，发扬文明以至鼓动天下人心的儒家规范。除此以外，他还汲取了作为道家理论契机的“自然”，用以发扬儒家所极意倡导的教化之说的理论，并视之为人文的起源和对人文评价的准则。当然，刘勰的人文还不止限于承传传统。更值得

重视的是他并没有把人文传统看成为一个凝固不化的东西，而是能用“望今”“参古”的眼光和熔铸古今的魄力，吸收了魏晋以来极其流行的、融汇了儒、道、玄的思潮。他既尊重作为人文规范的儒家的先圣经典，而与此同时，却又把圣人之所以成为规范的原因归结为符合于自然之道这一文化焦点。儒家重视“知人论世”，这到了刘勰手中，就又把魏晋人物“品藻”结合起来。从孔子的品评学生的不同特性到孟子的“以意逆志”，再经过魏晋人擅长的揉合人体美和精神风度的鉴赏，终于出现了《文心》的《体性》。此外，他还汲取了佛家的“因明学”，使之作用于“笼圈条贯”、“体大思精”的思维，显示了那一种几乎可以说是空前的理论性的绵密深邃特色，为我们民族思维结构开拓了科学性与形象性相结合的道路。

不同文化元素的融汇，在刘勰手中是有所去取的，也就是说经过了它的“弥纶”从而有所激扬。他不死守儒家传统而忘却“通变”，也不因笃敬孔子而排斥儒家以外的各家，如他盛称先秦诸子能“自开户牖”（《诸子》），各有发明。由于如此，他的融汇既立足于汉族文化，却又是放眼于中华民族文化整体。这一点首先可以从《原道》篇看出来。作者远溯人文起源，涉及到有关文化发生学诸问题，确乎是高瞻远瞩的。也正因为这样，《文心》之融汇民族文化价值体系的框架，决不是对多种文化元素的拼凑，而具有下列特点。

第一、《文心》不但通过三十五种文体从文章角度介绍文化传统，更透过这些或“文”或“笔”的作品，论析了人文遗产和文化的部分书面载体中蕴藏着民族文化的价值观念。如在《祝盟》篇中提出无神论观点：“忠信可矣，无恃神焉”，代表了儒家的宇宙观，在《谐隐》篇中，肯定那些有现实意义的

讽刺文学具有“抑止昏暴”的作用；在《诸子》篇中，简明扼要地比较论述了诸子百家的特色和他们崛起之际的时代背景；在《史传》篇中，对晋宋以前史书作了重点评价。这一系列对文化遗产的评述，固然主要体现了作者观点，但也可以从中看出他所受的传统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影响。因而人们不仅可以由此认识到文化传统价值观在刘勰心目中的体系，也可以启发人们进而探索融汇儒学传统与作为刘勰当代思潮的玄学在魏晋人眼中的文化价值体系。

传统思想是文化因素，同样与传统相关的价值观也是文化因素。而当人们把原有的文化因素放在他自己的价值体系中推理判断，这文化元素的性质便焕然一新。这在《文心》的弥纶群言中异常突出。比方，“教化贵文”、“修身贵文”原都是儒家传统的功利观，然而当刘勰论述到经书具有“致化归一”这一教化总目标时，提出了“性灵熔匠”，指出人文事业富于陶冶人们精神的作用，这一来，便显然赋予儒家教化以时代内涵。为什么呢？它吸收了魏晋人所津津乐道的“我辈钟情”的社会思潮和审美情趣。

第二、《文心》在文化上的融汇是时代狂飙中多种复杂思潮引起困惑并经过刘勰沉思而惨淡经营的硕果。处于南北朝时期，这一个大动荡、大分裂、大混乱的时代，给人们以梦魇的投影，引导人们的冥思。黄巾起义军的战鼓声沉没了，继之而起的军阀大混战将近百年之久，人民的疾苦深重，世积乱离，风衰俗怨。老、庄发展了，佛教也盛极一时。在梁朝出现了“家家扞戒，人人扞礼”（《南史·郭祖深传》）的局面。儒学虽说作为“四学”之一，但毕竟有些式微。特别是精神空虚的宫廷文学和唯美文学，带来颓废的风气和缚丽的文采，脱离生

活，也缺少真情实感。这些都使得这一位虔诚的孔子信仰者刘勰为之忧心忡忡。他怀着拨乱反正的“述先哲之诒”的心情毅然以澄清“异端”自命。一面要回归儒家之本，但一面却也欢迎“新声”而坚持“通变”，认为只有不断变革，才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通变》）。

儒学需要重振，然而他并不象裴子野他们那样的“止乎礼义”（《雕虫论》），连衣被了百代词人的屈原也在反对之列。刘勰从儒家中选出“三才”之说而赋以新意，用以张扬“人”的地位。齐梁文风是和儒家教化与文质统一说背驰的，因而他必须要从正面的“振叶以寻根”来拨乱。但他的“拨乱”又并非全面摒弃。他并没有一概剔除齐梁的文采和声律，他反对的是为文采而文采和为声律而声律，是离开了“心术”的“采”和并非出于“胸臆”的“律”。一系列的拨乱反正，在今天来说，就是对魏晋六朝时代民族文化价值体系的重新建构。

这里，他接受了传统和变革的两种挑战。裴子野表面是捍卫儒家传统，然而却取消了“文心”，从而抹煞了人文的关键——主体意识。齐梁之风表面好象十分重“文”，但他们丢掉了天地之心，离开了“自然”基础的艺术美，“人文”自然也就成为无根的东西。为了正确彪炳传统，必须接受通变的挑战，因而他把发挥自然之妙与发挥圣教之功统一起来。为了面向当时文坛的不良风气的挑战，他又把圣人所揭示的自然和作为引起人们情志的客观事物和现实生活的自然（《明诗》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结合起来，并将“自然”加以剖析，引向作为客体的生活体验的真实感，和作为主体的作者的真情实意的内涵。这样，刘勰就把人文教化和人文美感统一在民族主体意识之中而富于主动性和自觉性，以

抨击齐梁时期“因情造文”的不良倾向。

这一种儒家传统的承传包括了汲取魏晋思潮的“通脱”（鲁迅语）元素，实际也就是吸收了玄学与其源泉所自的道家，以道家的“自然”为契机，汇合儒家的刚毅扎实，面向人生，汲取“民本”思想，以“鼓天下之动”为怀，这都说明刘勰找到了儒家有生命力的传统，也说明刘勰对民族文化中不同因素善于区别对待地分析态度。他看到了时代、社会因素对文学的影响，但并不因此而无视文学、文章的特殊规律。他并没有把哲学思想、宗教思想和文艺思想胡乱凑合在一起。由于如此，人们可以看到定林寺的这位缙衣竟然也是孔子梦寻者。是一个佛教徒，也是一个东方式的人文主义者。一般说来，他并没有把佛教思想倾注到《文心》里来，自然也就谈不上“以佛统儒”了。这正说明，刘勰在融汇不同体系的文化的同时，既注意其某些共同质一面，也注意其相异质一面，而决不生拉硬扯。其目的在于保持同一民族文化中不同意识形态的自身规律。

这种文化交融，打上了动荡时代多种文化因素有机汇合的印记。我想，这也许就是刘勰的所谓“折衷”吧。他说：

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

其实刘勰说得还有点笼统。他对“旧谈”、“前论”的异同，并非一刀切；有的是虽同而不全同，有的是虽异而不尽异；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这恰是能做到他所说的“擘肌分理”，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就凭着这同同异异的“折衷”，《文心》融汇了若干文化元素的主导方面。《文心》一书，除了方法论吸收佛家的因明

学以外，多少受到某些个别佛家思想的影响是可能的，但它的融汇主要是中华民族内部范围内的交融。换言之，刘勰奉儒家为传统，以巍然崛起和风行一时的玄学思想以至整个魏晋思潮作为补充。而尤其吸收了作为玄学思想主要渊源的道家。儒家以修齐治平为人生态度，故持态谨严；魏晋赞赏老庄的清简逍遥，故崇尚通脱；而刘勰则既向往于儒家的“三不朽”而立意“树德建言”，但对“傲岸泉石”（《序志》）却也并未忘情。儒家讲“善”讲“真”较多，魏晋讲“美”较多；刘勰则力求兼而有之。可见统一在《文心》中的文化因素是来自多方面的，从这种“折衷”中，可以看到刘勰确乎是目击到中华民族在内部和外部的不同关系中所呈现的分裂的现象。他为此而寻人文之根，为此而从《易》中找武器，找孔子，找老庄，找王弼。总的说来，则是从思维体系的相关性出发找寻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在《通变》中他曾经说过，他要宏览“大体”从而把握主要的东西，亦即所谓“摄契”。

尽管这里是指具有书面载体的文化，然而结合广义的“文心”内涵来看，他对文章的“通变”的要求完全符合对民族文化诸体系相融汇的旨趣。

作为融汇的核心，就是以玄学来补充儒家文化体系传统。这传统是沐浴在特定时代和社会条件下的人文精神，是沐浴了魏晋思潮而时代化的儒家传统。

被东汉神权窒塞，被“上品”垄断遏抑，被长达数百年的战争破坏，被浮靡之风的文学腐蚀，多民族、多社会风尚的万态纷陈，佛教文化东渐的打破封闭形势，等等，显得一片眼花缭乱的魏晋六朝民族文化，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展示了一个富于纵深的座标系。这便是得力于魏晋文化的融汇而终于凝聚为

儒道互补的“人文”，形成了文化焦点。仅仅目之为文章学或文学学的宏著，似乎还嫌不够。过去，在对《文心》全书的总评中，有一位先生的评语我很赞赏，那就是原一魁提出的这么寥寥的一句话：

……陶冶万汇，组织千秋，则《文心》亦六朝之高品也。（《两京遗编后序》）

不提任何文章、文学问题，而只是突出刘勰对万般事理的熔铸力和驾驭力。虽说有点空泛，但也不妨借用过来说明《文心》这部书的理论核心确是朴素地认识了并阐述了人的对象化和对象的人化是“文心”的社会范畴，并为之唱出赞歌。他在《序志》里所追求的“腾声飞实”固然是他自己对“制作”的理想追求，但也是针对位于整个民族文化中的大写的“人”的主体意识（“文心”）的赞歌。这和西方文艺复兴前夕伟大诗人但丁的大声疾呼要人们“追求美德和知识”，“在人世留下他的一生”，而不应“象空中的烟云，水上的泡沫”（《神曲·地狱》篇第二十四、二十六歌）有沟通之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特别重视西方古典文化。他们对古希腊、罗马古籍的研究异常认真严肃，力图还古人以历史真面目，反对中世纪教会对它们的歪曲。而更为珍贵的是用新时代的眼光对之进行注释和阐述，汲取其营养，以丰富新兴资产阶级文化。这说明从传统中选取适应自己需要的理论武器，从而加以变革，使之与生活走向相契合，是人文主义的伟大成就之一。刘勰的极意发扬人文精神，目的也仍然在于把钟毓“五行之秀”的“人”从迷漫的谶纬烟雾中解放出来，踏着他心目中堪称最高楷模的先圣步武，走向“自然”的大道。西方的人文主义，刘勰的人文精神，这两股潮流对传统的尊重和变革基本相同，所不同的只

是西方人文主义对异端的抨击较之刘勰要激烈一些。刘勰的“折衷”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允执厥中”的色彩，与西方偏于彻底进绝似有不同。这一种东方的民族文化融汇模式，对处于优势的传统文化之汲取多种文化因素并从而改造之，使优势文化在融汇过程中加强其凝聚力说来，是一种有助于溶解异质文化并扩充自己的有效方式。

三、综合“言志”与“缘情”以强化 “人文”的主体意识

人文，就其表层言，包括物质产品、社会关系，外显行为模式和其它文化表象中显示人文因素的结构形式；就其深层与核心而言，意味着一些内隐的行为模式，或者是以协调精神世界为目的的人们的行动、交往和思索。既然是以后者为根蒂，那么，人文弘扬的关键就不能不深入到心理层次。比如说，龚自珍有感于晚清的世风堕落，慨乎言之地在南归和再次北上时所写的《己亥杂诗》中说过这么一句话：“颓波难挽挽颓心”。“颓波”是败坏的时代风气，而风气之所以败坏，归根到底是由于当时社会心理的败坏。通过这个例子，大概也可以说明一定时代和社会的人文盛衰隆替的根源。而就《文心》说来，大而文化、文教，小而文章、文学，作为“树德建言”的根本，也还是作为心理层的“文心”。从客体说来，是人文形态和人文结构，是具有规范作用的民族性格；从创造人文的人们，特别是刘勰心目中的圣人之文来说，则是“文心”的深层心理机制，文化创造者的主体意识。

在《文心》一书中，刘勰把这两方面统一起来，锲而不舍